

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工作模式和理念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实践为例

许钰函

文物定级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其本质是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系统判断。自2022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藏品保管部近现代革命文献库房分批次启动了馆藏革命文献的定级工作。近现代革命文献在载体形态、印刷技术、历史语境、存世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因此定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方法也具有特殊性。经过多批次实践，国博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应革命文献特征的定级工作模式。本文基于笔者参与该项工作的实践经验，系统梳理其操作流程与工作亮点，并就定级工作对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的理论意义进行探讨。

工作模式与核查依据

国博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工作在整体上延续“先整理核查，后召开定级会议”的基本流程，构建以“系统整理—精准核查—专家定级”为主线的工作模式，同时结合革命文献的实物特性，在操作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细化与调整。

整理核查的三阶段流程

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该阶段所涉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馆藏目录及研究丛书，以及相关研究论文、展览图录等，旨在为后续核查提供学术基础与文献依据。

文献物理信息的逐件核查。核查内容涵盖纸张类型、印刷方式（铅印、油印、木刻等）、装帧形式（平装、线装、毛边本等）、版本状况（初版、再版、翻印等）、完残程度等。对油印本、手抄本、伪装本等特殊形式予以重点关注，并记录其独特物理特征。如国博馆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纸张为粗糙的延安马兰纸，油墨渗透不均，边角有传阅折痕。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当时物资匮乏的历史背景，也成为判断其真实性与时代价值的重要依据。

案头研究的深度开展。包括比对不同版本、存世情况查考、梳理相关历史背景（如出版机构的历史沿革、文献所涉事件的历史地位等）。必要时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以验证文献的真实性与历史价值。比如国博馆藏一组20世纪50年代初期颁布的婚姻文书，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登记流程与典型案例。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婚姻文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体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法治建设。

三项关键工作

在整理核查过程中，以三项工作作为定级判断的核心依据，尤为关键：

版本与印制信息的厘清。近现代革命文献的版本鉴定侧重于出版机构、印刷批次、发行范围、再版情况等要素。核查时需重点关注：出版单位是否为解放区出版社或八路军办事处等；是否为初版或重要再版（存世数量仅有或稀有，首次颁布、印发、出版或最早使用，具有颇高的历史珍稀程度）；是否存在伪装本、油印本、手抄本等特殊形式；是否有作者或历史人物的批注、签名、印章等。这些信息是判断文献文物价值的重要依据。某些伪装本表面为普通读物，实则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党的文件，其具有特殊历史价值。比如，国博馆藏毛泽东著《论持久战》的伪装本《文史通义》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古典装帧，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李 端 丁淑娟

其封面右上方横向印有“社会学科类”字样，正中题签为“文史通义”。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背离”正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为规避查禁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保存状态及残损程度说明。革命文献多存在酸化、脆化、褪色、霉变等问题，定级时需详细记录文献的物理完残情况，包括缺损、缺封、缺附件；是否存在水渍、污渍、撕裂、修补、裁剪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文献的“残缺”本身可能就是历史的见证。国博馆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及《中国土地法大纲》，边缘残损，纸张发黄，背面留有战士手写笔记。此类痕迹不应视为减分项，而应作为文献历史真实性的的重要补充。

存世与稀缺程度的查考。利用《革命历史文献专题书目》《中国近代文献刊联合目录》及各大馆藏数据库（如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数据库等），查询同版本文献的存世情况。存世量少、流传范围窄、历史上曾被查禁或销毁的文献，其稀缺性更高，定级权重相应提升。如国博馆藏油印本《共产党宣言》早期中文译本，因排版疏忽书名错印成“共产党宣言”，其版本特征与已知版本皆不相同，也具有独特价值。

材料的整理与定级会议的召开

整理核查完成后，为每件文献编制详细的鉴定资料，内容包括：基础信息（馆藏编号、文物名称、作者、来源、尺寸等）；版本依据与历史背景；包括文献所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简要说明；品相及完残记录；必要时进行实物鉴赏；存世情况与稀缺性分析；查阅影像比对资料（与其他馆藏同版本文献的对比图）。

召开定级会议时，专家结合实物与汇总资料，综合判断文献的文物价值，确定其级别。值得强调的是，革命文献的历史意义、与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关联性、作为一手资料的稀缺程度等，往往成为定级中的关键考量因素。此外，文献的“原生态”特征——如原始批注、传阅痕迹、战时印刷等因素，也会纳入专家考量范围。

可以说，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的本质是对其文物价值的系统判定。通过定级工作带动日常整理核查，不仅有助于提升文献保管的科学性，也能促进从业人员对藏品的深入理解与专业能力的提升。

革命文献定级的理念认知

近现代革命文献的定级工作是提升从业人员文献鉴定能力的宝贵实践。革命文献的鉴定同样需要培养“遴选能力”，即区分文献价值高低、判断其是否具备定级标准的能力。而培养这一能力的核心路径，依然是人与文献的深度结合，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实物研鉴”。

实物研鉴的核心价值与实现条件

在革命文献领域，“实物研鉴”同样意味着能够看到文献、上手检视并实现常态化接触一手文献。从业人员需要主动查阅文献实物，记录其特征，比对已有著录，推敲前人判断。通过大量、持续的目验实践积累，逐渐建立起对文献纸张、印刷、批注、印章等各类特征的敏锐感知，最终形成对文献价值的直觉把握。

实现实物研鉴需要内在条件（内驱力、定力、求知欲、韧性）与外在条件（制度保障、时间安排、实物可及性）的共同支持。定级工作恰好提供了这一机会。

革命文献实物研鉴的特殊之处

革命文献的目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近现代革命文献包括图书、报刊、传单、布告、手稿、信件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的鉴定要点不同。从业人员需要熟悉各类文献的物理特征和鉴定方法。

二是近现代纸张酸化问题严重，实物研鉴时需更加注重文物保护，避免因反复翻阅造成二次损伤。必要时可借助高清影像及专业仪器辅助鉴定，实现保护与研究之间的平衡。

三是历史背景复杂，鉴定需结合专业知识。革命文献的鉴定往往需要结合党史、近现代史、革命史等专业知识，不能仅凭物理特征做判断。例如，同一份文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版本，需结合历史背景判断其出版时间和版本价值。这就要求库房管理员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储备。

四是存在大量伪装本、油印本等特殊形式。这些文献的鉴定难度较大，需要库房管理员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制作工艺，具备相应的鉴别能力。例如，伪装本的识别往往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出版审查制度，仅凭外观容易误判。因此，库房管理员在目验之外，还需加强相关历史研究，做到“文献内”与“文献外”的有机结合，形成“以物证史、以史证物”的双向互证能力。

关于定级工作的思考

在定级工作中，从业人员应当坚持以下三点认识：一是核查整理必须亲力亲为。前人整理过不代表自己可以省略。只有亲自动手，才能真正建立对文献的感性认识与理性判断。

二是专家定级应视为对工作成效的检验手段，而非替代库房管理员岗位职责。作为库房管理员，首先完成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在此基础上，对肯定的方面应予以保持，提出的不足应积极改进。这一过程是从被动配合向主动成长的重要转变。

三是具备遴选能力，才能承担定级工作。定级需要的不仅是“点”上的深入研究，更是“面”上的广泛目验与判断力。

目前国博馆藏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工作尚在持续推进中。已有的实践证明，以整理核查为基础，以定级会议为关键的“先整后定”模式，契合革命文献的特点，能够有效保障定级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以定级工作带动库房管理员能力的培养，是提升队伍专业素养的有效途径。随着工作的深入，相关模式和理念也将不断优化和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革命文物定级工作笔谈 ⑤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更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简称“红岩博物馆”）的立馆之本。

红岩博物馆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歌乐山烈士陵园）、《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陈列馆等机构，管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大楼、渣滓洞、白公馆等文物旧址54处，馆藏11.17万余件（套），其中馆藏文物9028件（套）、馆藏珍贵文物4165件（套），形成以纸质文物为主的馆藏体系。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和辉煌历程。

文物定级工作本质上是一次价值的审视、历史的考证和信仰的锚定。只有把文物基础信息、流传经历和价值意义等要素查清楚、写明白、研究到位，红岩精神才能在这些具体的历史遗存中变得可感可及，守护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才有坚实的支撑。

实践：持续推进文物定级工作常态化

红岩博物馆自2015年起，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歌乐英烈”“重庆谈判”“新华日报”四大主题开展文物征集工作，将新征集文物和馆内旧藏的定级工作纳入年度常规工作机制。截至2025年，已连续十一年稳步推进文物征集、评审和定级工作。

尤其是近年来的定级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24年，162件（套）藏品参评，57件（套）被评为珍贵文物；2025年，不仅评级新增14件（套）珍贵文物，更是对此前未通过复核的27件（套）一级文物的信息及价值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对史料档案的翔实考证和梳理后，全部评为二级文物。

这些数据背后有三条经验值得总结：其一，藏品定级的主体始终是“近一年新征集的珍贵藏品”与“馆内旧藏的系统梳理”。定级工作中，红岩博物馆结合馆内旧藏较多的实际情况，科学谋划文物定级工作，既对新征集藏品及时考证研究，又对馆内旧藏主动盘活。其二，新评定文物以纸质文物为主，符合馆藏文物体系的结构特征。其三，每年都有若干藏品被专家组明确标注“存世少、价值高、建议重点利用”。这一定级的直接标注，为后续展陈和宣教工作提供了新的文物支撑。

求真：定级的第一课是考证

文物定级的前提不仅是“有物可定”，更是“知其为何物、从何而来”。红岩博物馆藏有一件原名为“1949年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书”的棉布书信，通过信中内容，工作人员初步判定为渣滓洞烈士牺牲前对后人的革命嘱托。

然而，在2023年年度藏品鉴定评级工作会上，重庆市文物局专家组对这件“血书”的来历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它可能并非鲜血所写，要求红岩博物馆进行考证。红岩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行动。一是回查档案，红岩博物馆1979年10月的档案记载：“血书”由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烈士委托当地农民随一小孩带出，农民将小孩和“血书”托付予“红岩房东”饶国模。后由饶国模之女夏静于1979年捐赠入馆。档案还特别标注：“上述情况系夏静口述，翔实与否，有待查证。”二是走访在世亲历者，找到饶国模外孙女夏丹霞，厘清关键事实：遭孤与“血书”是两件事，当年被混为一谈；“血书”并非附在遗孤身上带出，而是临近解放时由川东地下党送至饶国模手上，缝藏在衬衣背部，书写者佚名且已牺牲；字迹可能是红色墨水或颜料而非鲜血。三是科技检测介入，红岩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团队从毛笔书写特征、字迹状态和颜色成色等多方面进行了检测和鉴定，指出书信内容不是鲜血所写，而是红色墨水或颜料，印证了口述考证方向。

最终，这件文物的流传经历被考证清楚，定名也得到了修正：它定名为“1949年佚名烈士托川东地下党带给饶国模的遗书”——作者虽不可考，但其背后的流传经历、对后人的嘱托、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并未因此减损分毫。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道理——革命文物的级别必须以“真实”为前提。一件文物一旦被定级、进入叙事、登上展线，它就成为公共历史叙述的一部分。红岩博物馆选择用档案、口述、科技三重证据去求证，恰恰是定级工作该有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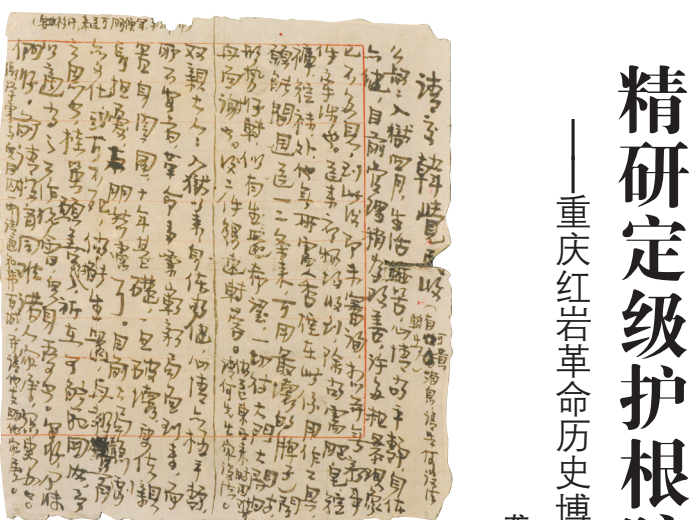
联动：定级基础上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定级工作的另一项成果，是推动馆藏文物档案从粗放走向精细。每一次鉴定都需要回溯征集时间与地点、来源途径、流传经历、当事人证明或知情人口述等材料。红岩博物馆在历年定级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要求馆内补齐每一件文物档案，包括名称规范、时代核定、来源澄清、特征描述、定级依据书面化等要素。

红岩博物馆馆藏以纸质文物为主，而纸质文物往往易出现发黄、脆化、虫蛀、水渍、断裂等问题，这都会影响文物定级时的可呈现性与定级后的保存。对此，红岩博物馆走出了一条专业路径：将古籍修复技术、书画装裱技术与新型丝网加固修复技术相结合，持续开展纸质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实践探索，已修复《棉花街壁报》等珍贵抗战文物143件（套）。同时，馆藏环境向“稳定、洁净、恒湿、低氧”的目标稳步迈进，数字化保护三期项目已实现4000多件（套）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建立了文物修复管理系统与图文数字资源管理系统。

成效：文物定级推动核心业务工作发展

红岩博物馆的实践表明，文物定级工作的成效与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1949年5月韩子重在狱中致父叔韩觉民的信

龚燕杰 吴统凡

一是管理方面，分级保护有了依据。文物定级解决了藏品“身份不明、等级不清、价值模糊”的问题。珍贵文物分级分柜储藏、按质地分类分库管理、建立监督台账和巡查机制，保护资源配置才有据可依。二是研究方面，定级过程推动价值挖掘。如2024年专家组重点关注的车耀先、韩子重、何柏梁等红岩英烈遗物，定级时所做的来源核查、背景梳理、关联人物考证，本身就是在为后续研究阐释和展陈提升积累学术经验；又如“血书”案例中，考证过程反而把一个模糊传说还原成了更可信的历史叙事，其信息量远超原有记录。三是传播方面，定级成果转化为展陈和宣教资源。定级之后，新认定的珍贵文物被纳入展陈体系，配合数字化展示、与红色旅游、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如2025年“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题展”中，“1946年晨社出版的《英）



1940年代龚澎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

斯坦因著英译铅印本《红色中国的挑战》初版（十册）”“1940年代龚澎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等15件（套）珍贵文物承担起叙事主干，发挥了文物活化利用的价值。

展望：定级工作的“下半场”该怎么走

站在连续十一年推进文物定级工作的基础上，红岩博物馆前瞻布局，聚焦关键课题。

推动革命文物定级标准的精细化。当前，革命文物缺乏专项定级标准，如革命文物稀缺性标准如何建立，是否有参照体系，各地理解不一，可能导致同一件革命文物在不同语境下评级出现偏差。红岩博物馆藏品大量涉及地下党组织、隐蔽战线、狱中遗存等，部分藏品存在史实“模糊地带”，更需要在国家制定的革命文物评定标准基础上，进行分类别、分主题、分证据强度建立内部定级参考细则。

建立革命文物“认定—定级—复核”常态化机制。将“新增藏品入馆→3个月至6个月完成来源考证与初鉴→年度批次提交定级→三年一轮复核校准”固定化为制度。特别是对征集渠道复杂、来源口述性强的革命类文物（烈士遗物、地下工作遗存等），应建立“征集档案—考证记录—鉴定意见”三位一体的追踪链，做到每件革命类文物都经得起时间检验。

让科研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血书”案例已经证明：博物馆需要的是自身队伍具备持续的史料考证、来源追踪和科学检测鉴定能力。可建立市级文物鉴定专家与博物馆中青年文博人员“传帮带”机制，同时引入颜料分析、纸张断代、墨迹成分检测等科技手段作为文物定级工作的核心工具。

做好定级工作的“下半场”，本质上仍是对革命历史真实性的坚守，红岩博物馆将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文物的价值梳理与身份认定，守护好红色根脉，让红岩精神通过革命文物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